

当前,全球经贸格局面临深刻变化,以知识产权为重点的全球竞争更趋激烈,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也面临着变革,知识产权博弈成为影响国际竞争格局的关键要素。

开拓全球市场 国内企业亟须提升专利质量

实习生 季天宇 本报记者 张晔

先后经历四起海内外的知识产权诉讼,涉及商业秘密及专利方面。截至目前,两起打赢、两起和解。

近日,在第七屆三江知识产权国际论坛上,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下称中微半导体)法务及知识产权执行总监姜鑫分享了企业“走出去”的经验:“全球知识产权规则是公平的,我们要掌握并有效运用这些规则,为自身所用。”

在世界经济大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有效激励创新和国际通行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最大限度促进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经济创新发展?融入经济全球化也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运用效率等提出了更高要求,知识产权工作如何作为?面对日益多样化的贸易保护壁垒,中国企业想要走出去,知识产权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国内外知识产权专业人士第七屆三江知识产权国际论坛,围绕“知识产权与经济全球化——机遇与挑战”纷纷建言献策。

专利布局的同时需考虑市场

在北京中技华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曹凯看来,专利是评价企业创新能力的最佳指标之一。针对企业技术布局,曹凯将国内企业同全球上百家同行进行分析比较后发现,华为超过99.99%的同行,大疆超过99.91%的同行,微芯生物超过93.4%的同行。

从2010年起,中国专利申请量连续8年全球第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关键研究,是近年来专利申请频繁的领域。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中国专利申请每年均在400万件,华为公司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

“中国知识产权40多年稳健向上发展,专利申请量已经够了,小学可以毕业了,接下来就要进入初中或者高中阶段,继续运用好。”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国内处高级主管梁建军表示。

但实际上,我国的知识产权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发明专利在专利总量中占比只有20%左右,且后期存在的流失率高达61%,远高于日本和美国的15%。

很多企业在开发了技术之后,在进入市场阶段

会败下阵来,其实是遇到了比技术更高的壁垒,换言之,企业在生产之初对市场技术需求的判断就已经发生了偏差。

专家认为,仅从数字解读中国的专利现状并不靠谱。“像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这些世界顶尖级高校,一年40多亿美元的科研经费也就申请100多项专利,而在我国很多大学专利申请一年就有一两千项。”深圳前海创投孵化器南京公司总经理邬涛表示,当申请专利不再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权益,而是其他功利性目的,专利的质量可想而知。

“我们的高校做产品,往往做一个产品的零部件,就花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做到很细,却忽视市场需求,虽然做的是硬科技,但是大家觉得比较‘虚’。”湖北省知识产权与创新研究院副院长罗海波曾在韩国待了6年,他发现,韩国企业的计划性很强,零部件技术他们不全是自己研发,他们会把需要的技术信息、市场信息传递给高校科研院所,高校研究出来之后可转让给企业。“这样做起来比较‘务实’,效率也高。”罗海波认为。



融入国际需应对多方挑战

“科技创新迎来全球化,知识产权保护更应是全球化的,可以说,知识产权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成说道。

韩秀成认为,通过引进的方式获得不了关键技术。我国企业应通过自主创新,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在“走出去”时提前开展知识产权布局,提高自身在全球市场的话语权,避免被他人技术“卡脖子”。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全球技术商业化和产业化迎来巨大发展,众多新技术涌现,很多领域面临突破,其重要的推动力正是全球化的合作过程。”世界华人技术经纪人协会副会长陶庆久表示。

中微半导体法务及知识产权执行总监姜鑫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战略性的资源,不应该仅仅从法律层面进行理解。”

而相对于专利,商标品牌在我国知识产权体系中的地位则更弱化。

截至今年5月,我国有效商标已经达到1970多万件,但是我国并不是一个品牌强国。2018年世界500强品牌中,中国拥有38个,美国拥有223个。

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唐恒认为,在各类知识产权中,品牌对经济的贡献是最大的。专家介绍,美国的知识产权体系聚焦专利、商标和版权,欧盟则是在专利、商标、版权、设计和地理标志上共同努力。

“品牌品牌正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实力,彰显国家文化魅力的重要途径,好的品牌能够有效吸引资金、人才、市场等各方面的资源要素。但是,品牌建设的周期长,投入也大,需要专门的管理人才去打造和经营,我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显然是不够的,品牌保护意识也不强。”

因此,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品牌,是我国企业打开国际市场、融入国际商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仅有知识产权法庭还不够

近年来,我国各级法院陆续设立了知识产权法庭。技术查明、专家辅助、司法鉴定等辅助手段则为法院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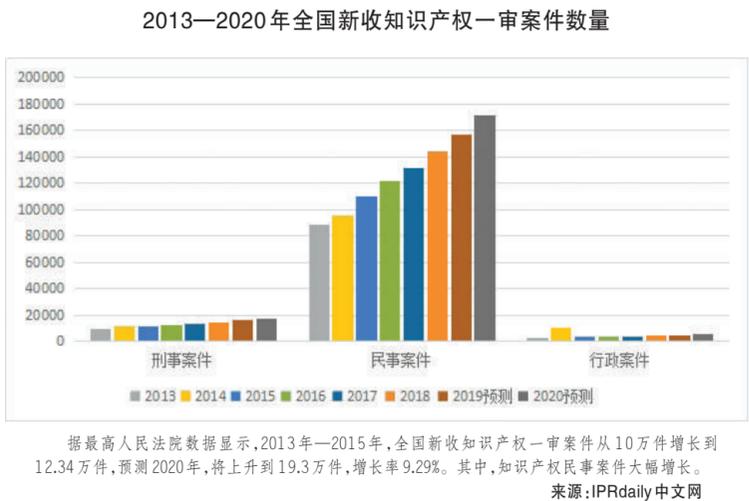
但是,据非官方统计,2017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10件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9件原告撤诉,另外1件判决败诉。10起案件,没有一例判决胜诉。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发现,即便有上述支持,法官也没有足够时间在开庭前了解技术背景,而是直接在开庭的时候了解技术,耗费了大量时间。”通鼎互联信息股份常务副总经理蔡文杰说。

专家指出,国内许多企业的法治意识并不强烈,一些中小企业从控制成本出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单薄,即使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也是消极应诉。

但是在海外,一旦出现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不仅仅是罚款,还会有很多惩罚性措施。

对此,韩秀成表示,应对新的挑战,首先要做到严格有效的保护,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在此基础上促进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才能更好地发挥知识产权对于创新的支撑和保障作用。企业和创新主体应积极了解并运用知识产权制度,让其成为开拓全球市场的助力而非阻力。

“国际贸易基本上是指十指紧扣,环环相扣的关系。”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孙远到持相似观点。他表示,中国应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更大程度融入国际知识产权规则,让外国投资者进一步认可中国市场。



赋予科技人员成果所有权,能否解决转化难题

第二看台

本报记者 叶青

“对于适合科技人员实施转化的科技成果,赋予科技人员所有权,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否则,会阻碍成果转化。”上海科委政策法规处处长、现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吴寿仁教授指出,如果允许这样做,应制定相关实施细则或操作流程,不设限也不盲目地鼓励或推动,让科技人员能够正常、顺畅地拥有科技成果所有权。

近日,在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岭南科学论坛·双周创新论坛”上,专家学者们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和职务成果所有权混改”,探讨如何走好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职务成果国有化不利于转化

四川省是较早探索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省份。2016年,四川省在20家高校院所启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今年3月,此改革推广到45所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

四川在推进改革试验中,依托西南交通大学率先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的完全国有化不利于科技成果转化。”西南交通大学研究院公司总经理康凯宁认为,职务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估值包含了相当一部分私人成分,非完全国有资本,高校院所不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因此应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的产权制度。

他提出了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的观点。“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不是资产。成果转化了才是资产,不转化不是资产。”他说,“科技成果价值具有极大的人身依附属性。赋予科技成果所有权是‘估值激励’,不是‘价值激励’。‘估值激励’可推动‘估值转化成价值’,提升科研人员创新创业动力。”

不适宜“一刀切”推进所有权混改

但不少专家学者也表示,赋予科技人员成果所有权,并不能完全解决成果转化中的问题。

吴寿仁认为,赋予科技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部分所有权,是将收益(即奖励金分配)的分配前移到成果所有权阶段进行分配。

在他看来,有时科技成果单一所有,有利于成

果转化,混合所有可能不利于成果转化。因为多个主体会加大协调难度,反而影响成果转化。“但有些成果由单位实施转化更有利,有些成果由科技人员实施转化更有利,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吴寿仁说。

“在规定科技成果转化混合所有的方案上,应该谨慎。”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谢惠加教授也认为,不适宜“一刀切”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混合所有。

一些由财政资助的科技成果可能涉及到科技安全,并不适合混合所有,如果个人也有所有权,可能会带来其他风险。“之前美国高智公司在中国大量收购专利,最后被教育部叫停。”谢惠加说,“如果专利都成为科技工作者个人所有,境外专利控股公司来跟个人合作,并把专利拿到手,反过来限制我国企业对专利的应用,这将带来更多的安全问题。”

让科技人员更有安全感

究竟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应该如何改,才能真正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领域中存在的权责利不明、动力不足、顾虑多等顽疾?

“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问题,赋予科技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这样的改革应该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

向,要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而不能为成果转化添堵。”吴寿仁建议,如果允许赋予科技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应制定相关实施细则或操作流程,供高校院所、科技人员选用;不设限也不盲目地鼓励或推动;要讲清楚“赋予所有权”政策的利弊。

华南理工大学道路工程系虞将副教授团队研发的“高韧超薄沥青磨耗层”技术,2018年作价3500多万元,并为这项技术的转化应用成立了公司。“在现有政策法规体系下,华南理工大学已走通科技成果转化作价入股这条路。”华南理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副主任葛瑞明表示,从他们的实践经验看,科技成果转化,除了要有好成果转化外,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涉及到的国有资产如何处置。他建议,政府应考虑把高校科技资源导向企业,并对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给予引导、规划。同时,高校自身也需要提高专利质量,多出优秀的科技成果。

与会专家学者不约而同提到,无论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如何改革,最根本的是让科技人员对科研工作有充分的安全感。广东省科技厅厅长王瑞军表示,我们应该创建更好的创新生态,让创新成本更低,并排除科技成果转化路径上的阻碍,让科技人员走得安全、走得放心。

热点追踪

克服水土不服近亲繁殖 均衡内外人才配置才是良方

本报记者 江东洲 刘昊

“在建设数字广西的过程中,人才的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如何均衡,才能获得最大效用?”近日,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桂林分论坛上,广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张灿龙提出了这一值得探讨和思辨的问题。

近年来,数字经济风起云涌,各地都在抢占数字经济这片蓝海。2018年8月,广西对数字广西建设进行全面部署,提出到2020年,全区数字经济总规模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0%左右,广西成为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和国际合作示范区。

“广西数字经济在全国,甚至是西南地区均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没有实力强的本地企业、严重缺乏人才、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是广西大数据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几个困难。”广西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政府事务总监谢勇说。

张灿龙认为,“人才、技术、产业是实现建设数字广西这一重要战略的三驾马车。广西人才支撑能力不足,从区外引进一些高端人才,能带来新的理念、技术和发展模式,但这些外部引进的资源也可能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培育和发展区内已有的人才,虽然可以克服水土不服的问题,但无法注入新的理念和技术,存在近亲繁殖,不利于优化升级”。

其实,广西的问题也是全国很多地方面临的共性问题。内部培养与外部引进,人才资源如何均衡配置?待遇与环境,哪个更能影响人才的去向?

“待遇与环境都很重要,比如一所地方大学想要建立全世界最好的科研高校,但是目前经济能力有限,就算提供力所能及的最好的科研环境,也不够吸引人才。所以既要考虑给科研工作者经济上的待遇,也要给他们提供好的科研平台、学术交流环境。”中科国鼎数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鹿泽光说。

鹿泽光还提出,外引人才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引进人才建设好本地的团队,培养更优秀的本地人才。可能外引人才会因为水土不服原因离开本地,但是智力资源留下来了。

“华为当年跟思科合作,为思科做代工,同时也着手培养自己的人才,研发新的技术,慢慢独立起来,走向成功。所以在数字广西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注重培养自己人才,发展自己的企业。”以华为为例,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党委副书记李辉认为人才应内部培养。

如何才能留住自己培养的人才?桂林理工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敬超建议,“引进人才之后,要提供更好的科研或者创业平台、更灵活的政策,发挥他们的作用”。

图个明白

多彩蝴蝶亲密接触参观者



7月14日,在西安当代美术馆举行的昆虫展上,种类丰富的蝴蝶与广大参观者亲密接触。图为一只蝴蝶停在参观者的指尖。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无人机助现代版曹冲称象



天津海关、杭州海关近日首次使用无人机辅助观测船舶水尺。无人机辅助水尺计量可以全程视频记录鉴定过程、有效还原工作现场,一旦发生货物短重情况可为国内企业索赔提供有力支撑,对船方也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同时,可降低企业的经济成本,提高通关效率,可谓一举三得。图为杭州海关关员操作无人机准备开展水尺丈量。

本报记者 陈瑜文 赵鹏摄